

引用格式: 乌尔里希·布兰德, 戈尔德·斯坦芬斯. 气候危机与社会学习[J]. 刘玲玉, 刘婧姣, 译.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5): 60-69.

# 气候危机与社会学习

乌尔里希·布兰德<sup>1</sup>, 戈尔德·斯坦芬斯<sup>2</sup> 著;  
刘玲玉<sup>3</sup>, 刘婧姣<sup>3</sup> 译

- (1. 维也纳大学 政治系, 奥地利 维也纳 1010;
2. 卡塞尔大学 社会学系, 德国 卡塞尔 34109;
3.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本研究首先回顾历史背景, 探究教育与社会学习之间的关系, 提出两者的内部关联主要体现在“自主性”概念上。其次, 从公众感知和政治行动的角度回顾了气候变化/气候危机的历史, 探讨知与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缘由并明确指出其集中体现在“帝国式生活方式”上, 且以这种方式投射到学习过程中。由此, 本研究解释了为何应将“社会生态转型”而非“生态现代化”视为更好的危机应对的方式, 并阐释了社会生态转型所衍生出来的必要条件。最后, 研究将所有的焦点引向社会学习, 以期重新获得社会的未来。

**[关键词]** 气候危机; 帝国式生活方式; 社会生态转型; 自主性; 社会学习和未来

**[中图分类号]** D033.3; 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22)05-0060-10

“未来星期五”运动(Fridays for future) 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群众运动, 该运动之所以能获得称赞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 “未来星期五”活动直白地将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抛到了公众面前: 人类对气候危机了解那么多, 为什么却做得如此少? 人类如何能够眼睁睁地拿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来冒险? 上述两个问题从根本上否认了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维持气候现状的合法性, 并要求打破政治优先的地位。此外, 上述两个问题揭示了气候危机缘起方和承受方、责任方和受害方的明显不对等, 开启了对争端前沿和抗议行为不同动机的关注, 并隐含了对备受重视的民主的呼吁。

第二个因素是, 活动中的逃学抗议是对严肃教育的挑衅示威, 因为这样的严肃教育未发生在

**[收稿日期]** 2022-03-12

**[基金项目]** “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立项项目

**[作者简介]** 乌尔里希·布兰德(1967—), 男,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授, 研究方向: 国际环境政治与政策、拉美政治、绿色资本主义和社会生态转型; 刘玲玉(1980—), 女, 江苏南通人, 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德语语言学、跨文化交流。

本文经作者授权同意发表, 译文有删节。

校园围墙之内,而是发生在公众对社会未来的争辩之中。“未来星期五”这个活动名字本身已经明确表达了那些示威的儿童和青少年能理解的内容:他们在学校场所内所学习的内容,只有在物质行星能继续存在的情形下,对他们的未来才有一定的价值,而这只能将“一切照旧”的规则在多个领域被打破的情形下才可能实现——即要在诸如原则上纪律严明且等级森严的学校中、在惯常的生活习惯上、在经济和政治等多个领域中打破该规则。

## 一、教育和社会学习

一旦我们开始探讨教育和社会学习之间的关系,就超出了教育学的认识视域,当教育和社会学习在讨论中互为条件的时候,学科观点的视角就过于狭窄了。

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打开视界,康德的小文章《什么是启蒙》可以充分解答这个问题,正如康德所说,那些独立且勇敢的人激发的东西最有可能在这些公众中发生<sup>[1]</sup>。如今,狂放不羁的松弛成了自由的象征,而认为人只有且仅受“一般思考原则”<sup>[2]</sup>的引领才能被判定为自由的认识,只能当作数字化时代之前奇怪的残留物了。摇摆不定的直觉和大量自负的抵触情绪可能会制造出怒气、风暴并引发暴力,却不能由此发展出拥有自主性的公众,但只有自主性的公众才是清晰表达的舞台,才是社会交流和集体教育的自我架构的媒介。

目前社会所需的必要基础是共同的有效规则,即“一般思考原则”,那些想保持正确但同时又否认“一般思考原则”标准的人,则陷入了自我矛盾中。借此观点,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将康德理性概念的内在逻辑演化为主体间逻辑和沟通逻辑。公众与理性的内在交叉作为行动标准的一般性规则已经在康德的思想中从道德上的基本形象及绝对命令(道德上的责任)上明确了。基于此,就像阿克塞尔·霍耐特所指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康德会在其启蒙文章中高度信任地将公众自我觉醒的学习过程视为“通往更好的历史之路”<sup>[3]21</sup>。因为将情况置于包含所有视角的一般性规则下进行观察,这就打开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道德行为者应具有的“主体性维度和时间维度”<sup>[3]21</sup>,这种维度可以构建解读过去的指南,也可以构建针对未来社会的畅想准则。

事实上,对社会关系进行教育反思并不能脱离对社会自身的批判性辩论,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其变得有说服力,才能持续性地激发公众进行辩论,并为教育开辟出新的社会维度。在自主性的实践中,那些不再从属于体制内教育关系且能自决的主体就拥有了话语权,正如这些主体所说,他们为所有的问题,不单单是教育问题,提供了“创造一个公众空间”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提供了新的社会议题,更重要的是发展出了新的集体学习形式。公众没有激烈的批判性辩论,没有自创性思想,就不可能突破传统权威、习以为常的程序及其理由。不再从属于体制内教育关系且能自决的主体从根本上重新整理了存在争议的社会政治领域(有部分是在如政党、教会、工会等现有机构内进行的)。学习型公众改变了社会对其自身的看法,揭开了自然关系、性别关系、隐性歧视和显性歧视,为来自社会的政治对抗提供了一种行为方式,并且由此突显了他们自身的重要性。

在学校里,自主性的学习型公众在部分极具冲突性的争论中赢得了地位,这部分公众不仅存在于学生群体中,也存在于不断扩大的年轻教师群体中。传统的学校教学方式很快就会受到新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方式的冲击,这是一种迄今为止仍被视为不常见的教师与学习方式的视角交叉:

学习被视为对社会未来的共同获得,主体的形成被理解为互相分享的社会化,知识的传授可以被  
视为共同认知兴趣视角下的协同性领会,要学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个视角下是可以且需要辩论的,  
原则上也是可以被选择的,同样,如何进行学习也需进行咨询策划,以便尽可能地让所有人发声。

在包括学校在内的机构场所内学习也可以成为社会自身学习的一种方式 and 未来,即自主性学  
习不仅是学校的终极目标,而且应该成为学校内部发展出来的前提条件,这种观点似乎在很大程  
度上被官僚主义的教学技术包裹了起来,他以“标准化”“模块化”“能力本位”和“并行教学”的名  
义再次封闭了自主性学习的空间。

批判性教育理论和政治教学的争论共同坚持的认知是,学校学习与公众是互相交叉的。带着  
主观预设的学习者和教师会在一些社会前提和条件下遇见。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探讨的那  
样,教育过程在一种自发的常识中表达出来,也就是从经验及见解之中表现出来,这些经验和见解  
是在高度矛盾的社会条件下形成并转换成特殊的实践和理所应当的常识<sup>[4]</sup>。葛兰西的基本见解  
是,这种矛盾的常识因五花八门的社会供给冠以连贯性,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被视作有意义的生活  
取向。然而,在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常识作为一种经验的表达,大  
多仍是焦虑的、权威的、保守的。哈默迈斯特认为,批判的-集体的教育过程应该能够实现一种突  
破,在某种意义上使人们有能力通过批判性的洞察力使自己的常识形成全新的连贯性,即走向自  
主性且具有批判性,其带来重要启示是“因此,解放学习过程不能理解为‘从外部’带给学习者的  
启蒙性实践,而是在常识中找到其基础,日常思维的不连贯性才是解放学习过程的起始点”<sup>[5]</sup>。这  
种可能成为学习痛点的非连贯性,在气候危机方面正好明显地显示了出来,例如,就像“未来星期  
五”活动表明的,当提到生物物理事实与处理这些事实的社会政治方式之间的明显差异时,这个痛  
点尤其明显。这里蕴藏着一种批判的-反思性的“自我教育自主性”<sup>[6]</sup>的巨大潜力,他可以成为因  
气候问题逃课的学生集体自我定位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二、气候危机与政治:眼睁睁视而不见的历史

正如对国家社会主义和他的犯罪行为的社会责任长期处于“集体沉默”一样<sup>[7-8]</sup>,几十年来资  
本主义国家对多重气候危机的处理方式<sup>[9]</sup>也反映了一段视而不见的历史。这种视而不见之所以  
令人惊讶,是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在大约 50 年间持续不断地受到公众的关注,不管是鉴于其测量和  
计算科学界日益增长的忧虑,还是热心群体所采取的一次次轰动的行动,或是对气候峰会等重大  
事件的报道,抑或是对国家政治争论和决议的报道,都表明了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 2018 年秋季发布的特别报告中强调,必须将全  
球气温增幅限制在 1.5 °C 以内,该报告预测,对照现状,到 21 世纪末,全球气温上升幅度将达到  
3 °C 以上,该报告还明确指出,气温一旦上升 2 °C 就会出现的严重后果及为实现 1.5 °C 的目标而进  
行必要减排的可行性。

为什么气候目标没能实现?为什么实现温度增幅限制 1.5 °C 的目标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回  
答上述问题需要看到在气候变化过程中有影响力的行为者在不可持续的发展中获利多少,这些行  
为者主要是化石燃料行业、能源和汽车公司(包括以工业化的农业为中心的企业及化肥制造商),  
他们在阻挠合适的气候政策变化,另外同样不可忽略的是,不可持续行业的从业者也非常想维持

这种现状,如传统的、日益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者或工业化生产行业的工人都希望继续通过尽可能免费地侵占环境而从中获取利润。工会正试图在“公平的结构变革”(Just transition)的理念下,通过一些框架内的倡议活动将良好的、有意义的工作岗位与社会生态结构调整挂钩,以此来处理这种紧张关系<sup>[10]</sup>。

不单单是工会正面临这一诘问:他们是否认真地允许转型,还是只是诡辩地对一切照旧进行美化?但恰恰在工会这个机构上,如果他们选择向气候中立和可持续性转变,我们可以看到,自我进步的、关注未来的力量需要与种种保守的束缚进行怎样的抗争<sup>[11]</sup>。为了超越立足于此时此地的成员利益,使社会生态转型的长期前景成为工会政策的指导原则,对此的争论也就应该是集体学习的过程,而其他成功生活的形式及其物质再生产的紧迫性和可能性又助推着这种集体学习过程。这样一个维度的任务,自然会使得想要共同“维持现状”的行动者和相关人员的联盟产生强烈的回避趋势,此种回避既适用于工会,也适用于国家政治领域,而且因为既要获得政治多数又必须能够维系目前的日常生活,就构成了一种系统性遗忘的基础,这种遗忘使得视而不见的顽固形式以及看似不断更新但也许只是被美化了的“维持现状”得以生成。

如何打破这个僵化的循环?个人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互相配合的机制在哪里以及如何联动?能否改变这种循环的方向、减缓循环的进程?是资本主义也可以,还是没有资本主义才可以或是要通过转型了的资本主义?哪些转型将是不可缺少的?明显的行星式气候危机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哪些习惯和日常做法,哪些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获取关系必须被打破或中和,才能让类似“未来星期五”这样的活动者的建议起效?未来如何重新成为社会构造的行动空间?接下来我们必然要有选择地、尖锐地来处理这些涉及面广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

### 三、社会认知和否定式行动:帝国式生活方式是阻力

社会对严肃的生态问题的明确认知与采取适当行动之间的两难境地,早已众所周知。然而,社会上对此的争论似乎并没有超出通常所说的“生态现代化”<sup>[12]</sup>的范畴,主要原因在于像国家、企业或公众等对生态问题的部分采纳,但却并不质疑其基本逻辑,如扩张型经济及其相对应的政治安全和媒体安全,这体现在前文提到的毫无用处的国际气候政策和国家层面的差异上。此外,生态现代化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被采用,最多被某些特定环境下的生活和工作实践所采用。要求实现生态生活方式本就很难,人们还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远”的诱惑,这从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的量产数据稳步上升可见一斑。

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可持续性得到了政策和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的有力保障。“帝国式生活方式”这个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帝国式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我们看来,是建立在社会的病态和生态前提条件永久外化的基础上的<sup>[13-15]</sup>,其囊括了在经济和社会的生态转型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如果不去解决所发现的这些问题,就完全谈不上认真处理气候危机——当然这还要考虑这些问题是否还有可能被解决,因为其缘由(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与其影响(气候变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不可忽视的是,帝国式生活方式是一个强有力的结构,其使得合理地、一致地构建社会的结构中会持续再生出隐性的甚至是显性的学习阻力。

帝国式生活方式不单单涉及生产过程中的企业和雇员,还包括公共部门和日常(消费)生活中

的人群,他们能够从其他地方获得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这种获得往往伴随着痛苦、剥削、矮化和生态破坏。“其他地方”也意味着全球“北方国家”内部的相互入侵。“北方国家”中有部分国家借此机会获得了采取行动的能力,带来了物质富裕,有些国家因为政治上的争取和意图还获得了运作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生活便利。然而,对另外一些国家来说,帝国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意味着他们生存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和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固化。一方面,帝国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矛盾性在于,许多人一边受益于这种方式(如购买廉价的产品),另一边又深受其害,他们不得不在基本上不受限制的竞争条件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帝国式生活方式虽然有强制性的要求,且替代性的生活方式很难得以实现,但是,这种消费刺激又迫使人们与这种生活方式进行妥协,尤其是在面子消费被认可且得到自我满足的时候。

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出现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北方国家”一致贯彻和推行了这种生活方式,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差异。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地方劳动力和资源的获取不断增加以及数字化生产对资源的严重消耗,导致帝国式生活方式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就像利用“南方国家”资源生产的产品一样,“北方国家”的人们也获得了“南方国家”低薪资的工人所生产的产品。在主观上,很多人都将这种体验视为富裕。然而,“北方国家”中新自由主义的分化,如低工资行业的扩张以及对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的经济剥削的加剧,都加深了帝国式生活方式。帝国式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北方国家”所有的人都同样地享受着这种生活。相反,研究表明,一个人生态足迹的范围,更多的是取决于其收入,而不是其意识,收入较高的人可以更多地使用在社会和生态问题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当前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是一种明显以地位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其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加剧了社会不公,加速了环境破坏。

显然,这种帝国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达到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极限。过去,也总有一些地区在某些情况下经历生态崩溃,但如今,生态环境的危险已经是全球性的危险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式生活方式大获全胜,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期,帝国式生活方式生产出另一个在政治上相当复杂的矛盾:虽然这种生活方式在危机时期发挥了稳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北方国家”,因为相对廉价的食品可以不断通过世界市场被投入大都市,但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危机却在加剧,包括随之而来的冲突,这又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北方国家”无法逃避帝国式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既不能逃避其生态后果,也不能逃避其社会后果),例如,因霸权争夺和资源控制而引发的战争或是“南方国家”经济衰退和生态破坏所引发的社会后果。然而,这些灾难性的关联,一经出现,就很快被遗忘,因为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继续,正是基于其先决条件和消极后果是应该持续被视而不见且可以被忽略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帝国式生活方式代表了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事件的清楚认知总是被遗忘,行动总是被不断延迟。对气候危机的社会学习,如果要持续下去,就必须超越围绕帝国式生活方式的自我免疫。

环境社会学家英戈尔弗·布吕多恩分析到:今天的“可持续的不可持续性”意味着,在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层面,能观察到的不再是理性、政治谈判和更好的论证,而是要从“责任、义务、约束和原则中解放出来”<sup>[16]103-105</sup>。本应从自身导致的不自主中解放出来,实现一级解放,如今却是“从上述这种解脱中解放出来”<sup>[16]103</sup>,来实现第二级的解放,因为拒绝资产阶级理想主义对文明、责任、尊

严、自主等观念的束缚,帝国式生活方式就可以被自由地施行、被认定是合理的。更有甚者,以“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优先事项的边界转移,这种倒退性的方式虽然往往更有利于“多重特权者”,而不是那些为右翼民粹主义反抗提供回应和多数民主代表的人<sup>[16]</sup><sup>105</sup>,但他们确实加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划分动机。在这一点上,布吕多恩看到了一个由最多多样化的左派解放派、右翼民粹派和激进市场活跃分子组成的“无声联盟”,他们彼此分离、彼此争斗,“但玩着共同的游戏”<sup>[16]</sup><sup>105</sup>。从布吕多恩的论证中,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示:若想从帝国式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只有通过批判纯个体主义对解放的理解才能成功。环境心理学家格哈德·里斯的论点使我们能够确定变革的视角和潜力:在环境问题上,特别是气候政策问题上,大多数人对自我的行动缺乏自我效能感,他们想的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行为更环保,能有什么意义呢”<sup>[17]</sup>?因此,里斯指出,这是一个集体效能的问题,即个人要将自己视为更全面的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这也正是社会运动、气候运动成功的因素之一。

虽然使越来越多的人(年轻人)生活得越来越环保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当不可持续和破坏性的框架条件政治化了,大量的有经验的自我效能才会产生。即使“未来星期五”运动看起来过于关注政府政策的不足,但恰恰是这样才开始了政治化的道路,将认为极具问题且具有破坏性的社会主题转化成了一个整体背景,被批评的恰恰是上述及从本质上构筑政府政策的行为者,尤其是政客和真正的富豪及当权者,他们“卖掉了未来,仅为了少数人可以赚到难以想象的钱”<sup>[18]</sup>。而那些因为气候合理性运动停课的学生以及其他的人,也把自己与这些问题关联在一起:通过他们的罢工和封锁,无论是在学校、道路交通还是在能源生产中,他们都树立了一个违反秩序的形象<sup>[9]</sup>。在德国,“到此为止”运动就以其野心勃勃的“能源过渡”在2011年以来的激烈的争论中成功地反击了所谓的环境友好的德国形象。在2038年淘汰煤炭的前提下,能源过渡已经很难说是电力过渡了,当然也不是交通和住房领域的能源过渡,而这种电力仍然是混合电力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在莱茵地区和卢萨蒂亚用褐煤进行的对于气候政治来说是灾难性的发电<sup>①</sup>。

社会学习要能够进行,需要通过科学知识及其普及,这尤其涉及对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的证明<sup>[19]</sup>。但社会学习也需要冲突和公众的行动,如“到此为止”“未来星期五”或“反抗灭绝”等运动,通过这些运动可以质疑那些看似不言而喻的现实和现有的权力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帝国式生活方式这一概念被赋予了启发性和聚焦性的关键作用,在这个概念中,学习过程的方向可以说是交叉的,无论是针对全球剥削关系的真实关联及其两侧的权力关系,还是针对全球剥削关系的历史成因,这些学习过程都可以适合生活在“北方国家”的人们的日常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转向学习主体自身及他们的生活方式。

#### 四、社会生态转型纲要

如上所述,环境政策大部分是在“生态现代化”的框架内发生的,迄今为止其成效甚微,显然需要采取更加治本的办法,即以生态和社会可持续的方式来重新组织危机四伏的自然与社会关系,而气候危机只是其中最明显和最政治化的表现。近十年来,围绕着“社会生态转型”的概念,不仅

<sup>①</sup><https://www.ende-gelaende.org/news/>.

展开了激烈的专业争论,也被更广泛的政治群体所接受<sup>[20]</sup>。

对社会生态问题敏感的、有社会影响力的进步阶层也意识到了这些严重的问题<sup>[21]</sup>。2015年9月,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诉求不小,而“变革我们的世界”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社会生态或社会转型或“大转型”<sup>①</sup>,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容器术语”,即一个包含问题领域的术语,其勾勒出一个新的政治与认知领域,同时标记出包含问题和危机及其原因的知识场域,并为制定有意义、有目的的战略及其可能的执行方案提供了空间。莱纳·里林精确地总结到:许多变革方式关注的是“改造资本主义,但只改造一半,处于中心的是工业主义及其充满活力的基础,而不是他的政治经济”<sup>[22]</sup>。

在此背景下,要进行转变那些理所当然的、几乎不被公众质疑的东西,如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关系和权力结构,全球的、欧洲内部及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以及以大都市为中心并深深扎根于其生产和消费结构之中的生活方式,就都必须摆到台面上来。这些改变需要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仅仅以更加强调整可持续的方式来转换生产和消费形式。

事实证明,政府在特定情况下是有能力采取行动的,而且当某个重大阶段被视为重要且有意义时,民众对此也是做好了准备的。在关于社会生态转型的辩论中<sup>[23]</sup>,核心共识是需要一种新的富足模式。当然,关于食品和居住、能源供应和通信、住房和服装等其他形式,早有过许多讨论、建议和实用性方法<sup>[24-25]</sup>。2008年以来针对巨大经济危机被广泛运用的是先进的工作时间政策<sup>[26]</sup>。这不仅指的是国家支持的短期工作,这种形式在2020年的头几个月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面对工作条件的日益灵活化和不稳定性,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提供充足的物质、稳定的收入、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生活便利。向共同现代化的转变应与有魅力的榜样形象一同出现:时间富有、对资源使用的适度需求、对世界市场廉价产品的节制使用。在社会生态转型所需的始发清单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增加必须项<sup>[27]</sup>。

我们需要很多有进步要求和进步行为的行动者来一同推动,包括通常处于社会边缘的社会运动组织,或是已经处于比较中心地位的先进协会,当然还包括工会、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他们可能是科学界、智库和媒体中的批判性人物和群体,也可能是进步的企业家(如教会组织在能源合作社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发展等方面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许这些人并无计划性,但他们进行着不同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消费行为。政党仍然是焦点,是更广泛的社会斗争的组织部分和表达形式,也是潜在的推动力。人们可以从气候危机及其与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因果关系的示例中学习个人和社会应当如何负责任地行动。在背离了普遍主义、责任和自主性的“第二级的解放”的视角下<sup>②</sup>,为使得帝国式生活方式保持其自身的一致性,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的隐含模范作用则陷入了争论。对证明帝国式生活方式合理性的各种倾向进行变革性的批判,是在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开辟新视角的学习过程中重建普遍相互理解、重建同理心和共鸣能力的重要先决条件,也是发展团结一致的生活方式的的重要先决条件。

①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对工业资本主义前过渡阶段的描述在其语义上并非偶然。

②该视角遭到布吕多恩明确的批判。

## 五、基于未来式生活方式的教育和社会学习

向气候合理社会的转型过程需要大大削弱资本增长的需求,近几年来,关于去增长/后增长的讨论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后增长辩论并不是处理各种危机现象的一种愉快而肯定的方式,因为他总会影响到弱者,后增长意味着:

[……]一方面,是对经济增长霸权的根本性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对增长和社会的不同批判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后增长又是一种建议、愿景或乌托邦,建议一种其他的社会形式和其所要求的系统化的转型<sup>[24]14</sup>。

在广泛的辩论中可以明确一些共同点:第一,全球生态公平、社会的民主塑造、自我决定的实现以及经济增长的独立,并为此不断提出各种策略和具体步骤<sup>[24]175-228</sup>,除此之外,后增长的辩论主要是要忘掉习惯和特权,但同时不应将其视为损失或放弃<sup>[24]230</sup>。弗里加·豪格认为,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摒弃旧结构,戒除习惯,消灭‘已知’”<sup>[5]281</sup>。在这一方面,学校教育和社会学习过程是很重要的。施梅尔策和维特指出“思考和尝试的空间”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年轻人可以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学习过程中获得动力,培养其自主性和行动能力,由此葛兰西所提到的必然矛盾的日常心态可以批判地逆转过来。第二,社会生态的转型将伴随着相当大的冲突,因为目前生产和生活模式的受益者,如石油公司、汽车公司、许多收入较高或财富较多的人,不会不战而退。在转型争论中,很大一部分人对矛盾估计不足,想象着一种双赢的局面。在我们的教育和学习理论的思考中曾提到冲突的重要性,争取气候合理的运动体现了转型具有争夺性的特征。第三,从批判与解放的角度来看,很重要的一点是——“拯救气候”的目标不仅有助于避免更大的生物物理失调,还进而避免社会失调。社会生态转型应坚持一个好的社会的引领理念,最核心的是,除了维护生命的自然基础之外,还要使人格得到自由发展。迪特·克莱恩称这是“一个稳固的和平社会的支点”<sup>[28]</sup>。为了实现自主生活,需要满足社会条件和设置相应机构,以确保民众获得自主性,能够积极参与物质和政治生活,这对民主政治有启示作用,也就是说能对民主本身的产生条件进行政治化,例如,形成公共空间、参与并共同决策<sup>[29]</sup>。这样,气候合理的普遍主义诉求得到了特别好的表达,但这一视角有时在气候政治的充满灾难性和反乌托邦的辩论中似乎被忽视了。

我们认为,在社会生态危机的条件下,应坚持个性自由发展,在社会生态转型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康德的主张,即自由意味着个体和集体要保持理性、合理使用,这在社会生态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成了当前的热点。以理性对抗帝国式生活方式,启动社会生态转型,需要有一个承认社会约束力的自由概念。从合理节制的意义上看,设置限制是必要的,同时,不以牺牲他人、牺牲自然为代价的社会规则也是必要的。换句话说,要在社会生态边界内自由生活,就必须能够有过这样生活的条件,能够团结一致地思考和行动,而不是被困在一种不断破坏未来生计的生活方式的金笼子里。这是“未来星期五”运动对未来愿景的核心思想,也是更广泛的气候合理运动的核心思想。气候合理运动坚信,呼吁以最环保的方式来消费是不够的,这种将问题个别化的做法低估了现有体制以及不平等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影响。抗议的青年并没有被完全个人化的自由主义所迷惑。现在是时候改变意识、行为和习惯了,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改变的社会整体。团结一致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前提是洞察力和自主性以及能够以其他方式来生活的特殊能力。正如康

德已经指出的那样,洞察力和自主性本该是个体的,但在社会学习的过程中,个体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更何况气候危机在各个层面来看都是一个明显的社会问题,我们不敢说要克服他,那么应对他需要有勇气将未来重新看成社会构造的空间。“未来星期五”为此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气候运动对未来概念的关注,击中了现行社会认知的致命弱点。当一分为二的自主性将对未来的设想引入自己生活的未来空间时,社会未来的空间就只能任由资本利益至上了。如果不打破这种对未来的双重私有化的默许,向可持续和稳固的现代性过渡就不会成功,对社会未来的重新占据,无疑会面对非常强大的反对势力。只有通过诸多冲突,才有可能创造出符合气候友好型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批判性学习过程中形成充分的理由和富有回击力的见解。

#### [参 考 文 献]

- [1] KANT I.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C] // WEISCHEDEL W. Werke in zehn Bänden. Bd. 9.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5: 53-61.
- [2] KANT I. 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 [C] // WEISCHEDEL W. Werke in zehn Bänden. Bd. 9.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5: 263-393.
- [3] HONNETH A. Die Unhintergebarkeit des Fortschritts: Kants Bestimmung des Verhältnisses von Moral und Geschichte [C] // HONNETH A. Pathologien der Vernunft: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7: 9-27.
- [4] GRAMSCI A. Gefängnisheft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in 10 Bänden, ( Heft 6) und Bd. 6, ( Heft 11) [M]. Bd. 7.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mit Ariadne, 1999: 372, 1371.
- [5] HAUG F. Lernverhältnisse: Selbstbewegungen und Selbstblockierungen [M].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2003.
- [6] DARM R, LANGE D. Mündigkeitsselbstbildung als Referenzpunkt der Demokratiebildung [C] // KENNER S, LANGE D. Citizenship Education: Konzepte, Anregungen und Ideen zur Demokratiebildung (Politik und Bildung). Frankfurt am Main: Wochenschau Verlag, 2018: 49-59.
- [7] LÜBBE H.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m deutschen Nachkriegsbewußtsein [J].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83, 236: 579-599.
- [8] STEFFENS G. Vom kommunikativen Beschweigen "zur Ergreifung des Worts" -Anmerkungen zur Diskursgeschichte der Nachkriegszeit [C] // SVEN K, GERD S, EDGAR W. Jahrbuch für Pädagogik 2009: Entdemokratisierung und Gegenauflklärung.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9: 15-40.
- [9] KRAMS M, BRAND U. Die Klimakrise: Ursachen, Handlungsansätze, Kritik [C] // FORU M. Politische Bildung, Umwelt, Klima, Politik. Wien: Wograndl Druck GmbH, 2019: 5-14.
- [10] FERCHER S. Schluss mit heißer Kartoffel! Klimapolitik ist Verteilungspolitik: Nur mutige Politik kann die Wende schaffen [J]. Arbeit & Wirtschaft, 2019(7): 6-11.
- [11] BRAND U. In der Wachstumsfalle: Die Gewerkschaften und der Klimawandel [J].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2019(7): 79-88.
- [12] BEMMANN M, METZGER B, VON DETTEN R. Ökologische Modernisierung: Zur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eines Konzepts in Umweltpolitik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M].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2014.
- [13] LESSENICH S. Neben uns die Sintflut: Die 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 und ihr Preis [M]. München: Carl Hanser

- Verlag: 2016.
- [14] BRAND U , WISSEN M. Imperiale Lebensweise: Zur Ausbeutung von Mensch und Natur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M]. München: Oekom Verlag , 2017.
- [15] BRAND U , WISSEN M. Gesellschaftliche Naturverhältnisse und materialistische Menschenrechtspolitik-Zur Kritik der imperialen Lebensweise [J]. Jahrbuch für Pädagogik , 2011( 1) : 125-139.
- [16] BLÜHDORN I , BUTZLAFF F , Deflorian M , et al. Nachhaltige Nicht-Nachhaltigkeit: warum die ökologische Transformation der Gesellschaft nicht stattfindet [M].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 2020.
- [17] SCHMIDT R. Was bringt es der Welt , wenn ich auf einen Flug verzichte [N/OL]. [2022-02-25]. <https://www.faz.net/aktuell/stil/leib-seele/umweltpsychologe-im-interview-rettet-mein-verzicht-das-klima-16504939.html>.
- [18] THUNBERG G. Wir haben keine Ausreden mehr [J].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sere letzte Chance , 2019( 6) : 59-62.
- [19] HAGEDORN G. Scientists for Future: Aufklärung gegen die Klimakrise [J]. B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sere letzte Chance 2019( 9) : 57-64.
- [20] BRAND U. Transformation als " neue kritische Orthodoxie" und Perspektiven eines kritisch-emanzipatorischen Verständnisses [C] // MICHAEL B , BOIF R , MICHAEL T. Transformation: Suchprozesse in Zeiten des Umbruchs. Münster u.a.: LIT Verlag , 2016: 209-224.
- [21] 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 der Bundesregierung Globale Umweltveränderungen ( WGBU) . Welt im Wandel [EB/OL]. [2022-02-25]. <https://www.wbgu.de/de/service/presseerklaerung/gesellschaftsvertrag-fuer-eine-grosse-transformation>.
- [22] RILLING R. Wenn die Hütte brennt...Energiewende , greennewdeal und grüner Sozialismus [J]. Forum Wissenschaft , 2011 ( 4) : 14-18.
- [23] MICHAEL B , BOIF R , MICHAEL T. Transformation: Suchprozesse in Zeiten des Umbruchs [M]. Münster u.a.: LIT Verlag , 2016.
- [24] SCHMELZER M , VETTER A. Degrowth/Postwachstum zur Einführung [M]. Hamburg: Junius Verlag , 2019.
- [25] SCHNEIDEWIND U. Die Große Transformatio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Kunst gesellschaftlichen Wandels [M].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 2018.
- [26] PERISKOP. Von A wie Arbeit bis Z wie Zukunft: Arbeiten und Wirtschaften in der Klimakrise [M]. Wien und Berlin: Gugler , 2019.
- [27] KOLLEKTIV I L A. Das Gute Leben für Alle: Wege in die solidarische Lebensweise [M]. München: Oekom Verlag , 2019: 175-230.
- [28] KLEIN D. Zukunft oder Ende des Kapitalismus? Eine kritische Diskursanalyse in turbulenten Zeiten [M]. Hamburg: VSA: Verlag 2019: 185.
- [29] FRIEDRICHS W , LANGE D. Zugänge zu einer zukünftigen Demokratiepoltik [C] // FRIEDRICHS W , LANGE D. Demokratiepoltik: Vermessungen-Anwendungen-Probleme-Perspektiven.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6: 3-7.

[责任编辑 章 诚]

expression ,clarifying the main supervisory posi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partment , and supervising the main body's performance with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t the level of normative construction ,this mechanism is configured in the chapter of basic provisions of pollution control code , creating basic and supporting provisions ,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djustment provisions and the boundary of basic principles provisions.

**Klimakrise und gesellschaftliches Lernen**

*Ulrich Brand ,Gerd Steffens; translated by LIU Lingyu ,LIU Jingjiao*

**Abstract:** Looking back at historical contexts , the article first as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al learning processes , as well as the reasons behind their internal connection which can be shown in the idea of autonomy. After taking a look at the history of climate change/climate crisis in public percep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 it turns out , can be analysed as *imperial way of living* and as such critically reflected for learning processes. Next , the authors explain why they consider a “socio-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rather than a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o be the better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crisis and list the imperatives for a socio-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inally , the article unites various views of social learning at all steps of the argument under the banner of re-appropriation of the future of society.

**Ulrich Brand's Theory of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U Chuanguo*

**Abstract:** Ulrich Brand believes that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t the cost of resource plundering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has become popular in many countries and is the deep reason that causes and intensifies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Only by changing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and building a “solidary mode of living” , can we truly solve the crisis.Brand's theory reveals the daily production and life basis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among the public all over the world ,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 promoting a global coope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enlightening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 as well as proper strategies and counter measures from all fields.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Resource Use Reg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ing Civil Code**

*WANG Haiyan*

**Abstract:** China has not yet constructed a forest resource use regulation system that defin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forest resource rights and public author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restructuring forest resource use regulation. The "Green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 set out the green boundaries of private autonomy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public intervention in forest resource rights. The "Green Principles" clarify that the institutional objective of the regulation is to effectively use forest resources to achieve the public demand for forest ecological services and to reduce the cost of the regulation. The prohibition of abuse of rights clarifies the boundaries of public authority in the regulation: public authority should restrict private rights if the abuse of private rights by the subject of the right impedes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forest. The forest resource use regulation system should also prevent public authority from using the principle of prohibition of abuse of rights to interfere excessively with private rights. The expropriation provisions further clarify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and conditions of compensation for public authority to interfere with private rights based o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regulation system should give corresponding procedural rights to forest resource right subjects. The system should also raise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for public welfare forests to maximiz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forest resource rights holders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public ecological interests.

**On Legal Protection of "Regional Landscape":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Japan**

*LI Chengling*

**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dscape legislation in China , due to the public attribute of landscape , the landscape protection appeal of regional residents beyond the neighboring right cannot be effectively responded by the judiciary. The landscape lawsuit in Japan has also encountered similar difficulties as that in China , and the lawsuits about Kunitachi Mansion , combined with the regionality of landscape protection , has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from the general protection theory of public law to the individual protection theory in administrative lawsuit , as well as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landscape protection in private law in civil lawsuit. Japanese scholars also demonstrated the legal composition of landscape interests in regional space from the two directions of right system and legal order ,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 and regional rules in regional landscape protection. The protection of regional landscap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can explore the right basis of regional residents to protect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order guarante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Super Efficiency Model and System GMM Model**

*LI Limei ,LAI Yongbo ,XIE Jinlong ,HE Xiuling*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green development to identify precisely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 this paper uses the super-efficiency EBM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112 ke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8 , and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tested by GMM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ly shows a "W-shaped" and ha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 2)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takes a "U-shape" and the current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in the suppression stage. 3)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exerted indirect influence o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through three factors , namel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 factor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technological spillover effect. Among them , the first is embodied in that the "compliance cost effect" is greater than the "innovation compensation effect"; the second promotes the optimization of factor structure; and the third shows that "production reducing effect" of foreign-funded technology is greater than its "quality improvement effect".